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 陈 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神圣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救亡图存，携手合作，与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取得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1931年日本发动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当起打败日本法西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任。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从1931年9月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派几百名共产党员到抗日义勇军中去组织对日作战，并创建了若干有战斗力的抗日游击队与日本法西斯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影响的抗日联军就有十一个军3万多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东北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御侮，为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组织领导了全国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这说明在国际上法西斯战争力量极度膨胀，国际绥靖主张、国内恐日思潮泛滥，特别是蒋介石集团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中流砥柱成为中国抗日最坚强的力量。

从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强盗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人民战争和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继续发挥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面对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提出了依靠人民战争夺取抗战胜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抗战路线。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明确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了和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支持的敌后战场。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平型关、神头岭等一系列战役和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军心民心。在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德日意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狂的背景下，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打击，振奋了人民抗击法西斯的士气。这期间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使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希望所在和革命圣地。

从百团大战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承担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担。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者把八路军、新四军作为其主要军事打击目标，在华北连续发动“总力战”“治安强化运动”等，在残酷的“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结合化学战和细菌战，搞惨无人道的“无人区”等，妄图摧毁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和抗战意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敌后战场出现了极为严重困难局面。共产党依靠人民经过浴血奋斗克服了各种困难。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民族英雄的事迹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更激发了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的气概。人民军队于1943年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并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等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5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始战略大反攻，歼灭日伪军，扩大解放区。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人民军队也付出伤亡60余万人的代价，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在激烈残酷的战争中，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人。如果说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奇迹，纵观14年抗战，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创造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巨大贡献

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国民党改变了过去的妥协态度，坚持了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国共两党经过谈判，终于达成了第二次合作。在军事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奋起抵抗，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些大规模的会战粉碎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战略，使之兵力分散、战线延长；国民党爱国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吸引了友好国家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援助；为政府机关和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也有利于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这期间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对重庆等地实施轰炸平民等罪恶，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等严重局面，国民党没有在巨大压力下屈服。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给日寇造成了重大杀伤。国民党在这一阶段虽然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还制造了“皖南事变”等反共事件，但从总体说，继续领导着正面战场的抗战和坚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国民党继续坚持抗战。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国民党在苦撑危局的同时，抓住机遇积极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一爆发，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还宣布对德、意处于战争状态。同日，蒋介石还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1942年元旦，由中英美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42年1月3日，正式成立了以蒋介石任最高统帅的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越南、泰国等同盟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国的持久抗战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中国废除了与美、英签订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中国还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创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战役、常德战役、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等大规模会战，中国战场继续牵制日本陆军的主力，并给敌以大量杀伤。国民政府还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特别是第二次缅北会战，国民党将士英勇抗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加速了日军的失败。虽然这期间国民政府的部分官员出现严重腐败等问题，还出现了消极避战及豫湘桂战场的溃败等情况，但国民党及其军队还是坚持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八年全民族的抗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国民党军队也付出了322万人重大伤亡的代价。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血洒疆场，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大批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和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国民党广大将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流血牺牲、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侮

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华民族的强烈反抗。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中国人民和部分爱国军队，就开始了伟大的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从10月份开始，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打击日寇。11月，黑龙江省驻军进行了嫩江桥抗战，其他驻军也组织了艰苦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坚持长期的极其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1月，中国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淞沪抗战。1933年3—5月，中国军队进行了长城抗战。1933年5—7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察东作战，收复失地。1936年11月，中国绥远驻军抗击日军进攻，取得收复重镇百灵庙和大庙的胜利。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兴起。著名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坚决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张澜、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著名民主人士都为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局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各种救国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面临日本法西斯侵华造成的亡国危急，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青年学生发表通电，集会请愿。学生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集中兵力，驱逐日军出境；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等要求。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中国工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9月上海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进行反日大罢工。全国抗战爆发后，山西、广州、南京、武汉等地工人相继组成工人救亡协会等团体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活动，陇海、平汉、津浦等铁路干线的职工，冒着敌人的炮火和空袭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到前线。河北开滦煤矿7000余名矿工参加声势浩大的冀东大起义。中国几亿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是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抗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中国广大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战，他们一方面捐钱捐物、募集巨款支援前线；另一方面加紧组织生产，为抗战提供军需民用物资。广大爱国妇女积极参加为抗日征募捐献、救济难民难童等活动。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抗战胜利作出贡献。当日本法西斯强盗大举侵华、祖国面临危亡时，广大海外爱国华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的抗战捐款，占当时海外华侨总数的二分之一。华侨的捐款、购买公债、侨汇和回国投资对祖国抗战经济支援巨大。有很多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有成千上万的华侨青年血洒疆场。广大文化教育科技人士，他们用笔和智慧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民气与中华民族之敌血战到底的巨大作用。

中国人民以空前的觉醒、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在前线、在沦陷区、在大后方、在海外，以各种方式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海外华侨，全国的少数民族，港澳台的爱国同胞，显示出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和敢于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全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全民族坚持抗战，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在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同胞都应该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70年前我们靠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爱国精神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今天我们还要靠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爱国精神来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和复活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阴谋，并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综合国力，坚决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海峡两岸同胞应该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随想录

文不己出

□ 游宇明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过这样一句话：文人是要文必己出，史家却要文不己出。这句话初听起来觉得莫名其妙，仔细想想，颇有道理。说文人要文必己出，大家都是点赞的。创新是文学的第一生命，只有提供他人没有的东西，给读者以陌生感，读者才有走近的热情。没有创新，你写的东西跟别人写的面孔、眼睛、灵魂都相似，谁还会浪费时间来阅读你的所谓“作品”？说史家要文不己出，争论就出来了，有人认为章学诚提倡做文抄公。其实这是冤枉了他老人家。章氏一生所写史学著作多矣，他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方志略例》都是一等一的史学名著，无一本涉嫌抄袭。自己都不抄袭，怎么可能建议别人去抄袭？

其实，章氏的所谓“史家”要“文不己出”，不是指史家必须陈袭他人的著作、言论，不要有个人创见，而是指史家评事论人必须有史料上的依据，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章氏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番话的，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他的这个见解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最近看到一本写唐朝的书，作者据说有“幽默讲史新掌门”之称，出版商在封面上做了如此提示语：“易中天没这么幽默，当年明月没这么犀利，袁腾飞没这么有味。”可是读了前面40页，我就再也没有心思读下去。不是作者的文采不好，也不是书的故事不够吸引人，而是因为虚造得太厉害。

为了引用的“原生态”，我姑且做一回文抄公。该书第三章《高宗李治：如何征服男人》开头这样写道：“史书上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正坐在龙椅上享受悠然人生，突然之间他泪流满面，跳将起来，冲到墙壁前，拿自己脑壳照墙壁上哐哐哐地撞过去。当时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老臣子吓得呆了，急忙上前拦住：陛下，别撞了，歇一歇吧，万一你把这墙壁撞出个窟窿来，又是一笔不小的建筑工程费用开支……只见李世民大哭道：哥儿几个，你说哥们儿我咋就这么倒霉呢，我费了牛劲，杀了哥哥，宰了弟弟，还差点干掉老爹，这才抢了个皇帝来干干，可是你看看我家里的那几个儿子，都他娘的有家族遗传性精神疾病……这可咋整啊？”

也许唐太宗曾经为了儿女的不成器，确实有过以头撞墙的冲动，一向以“从谏如流”著称的唐太宗也许会跟臣子诉说自己的心事，但大家不会相信臣子在皇帝以头撞墙时会说出这样轻佻的话，更不相信皇帝会对臣子说“老百姓都传说唐三藏的三个徒弟没一个好玩艺儿，不是猴子就是猪，要不就是深海鱼类，叫什么沙和尚”之类的话。道理很简单，说唐太宗知道有关《西游记》的传说，晓得传说中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实在荒唐。

历史不是泥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它像木石，每一次雕刻都会留下痕迹，对它保持敬畏之心，是史家的道德底线。我们可以用一定的现代术语解释过去的事情，也可以用语体文翻译古代的一些对话。但这种解释与翻译，不能加油添醋，更不能无中生有，否则就不是写历史，而是编故事了。

仔细想来，某些写史者之所以做不到“文不己出”，其实是源于内心的驱利冲动。幽默讲史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做成书也就有了销路。写书有销路，作者就可以拿到版税，销得越多，版税也越多。只是读者知道自己所读的历史都是“幽默讲史”者心血来潮的编造之后，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以后还会像现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自己原本不丰厚的腰包吗？

“文不己出”，是历史写作的基本做法，标示着史家的真诚与良知。

有所思

商鞅变法为何有效

商鞅改革中对于法律责任的追究，固然规定了重刑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法网之严密。相比刑法的重刑主义，法律责任的严密可能更能起到警戒作用。商鞅改革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让社会的上中下层都予以信服，形成改革的合力。

□ 张学博

回顾商鞅改革的历史，其立法思想有的值得借鉴，如立法引导改革和注重法律实效，有的则应予以反思并修正，如重刑主义思想。

立法引导改革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具体立法主要是九个方面内容。

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得买卖之法令。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村、甲三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

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

应该说商鞅变法是典型的通过立法引领改革的成功案例。通过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推动改革，无疑具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优势。

法律责任的严密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的。《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

商鞅改革过程中，注重通过强调法律责任的规定来强制老百姓遵守法律。实际上这与当时百家争鸣有关。商鞅治理秦国十分重视刑法的惩罚作用，并且主张用重典来推行自己的政策。这种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历次的严打刑事政策虽然不是治乱世，但是是这种思想的延续。今天来看，商鞅改革中对于法律责任的追究，固然规定了重刑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法网之严密。相比刑法的重刑主义，法律责任的严密可能更能起到警戒作用。

注重实效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注重实效不尚空谈的特征，与传统的儒家大相径庭。通过取信于君主、贵族和平民，取得社会各层的支持，共同推动改革进行下去。

首先是取信于君主。从三次会面来看，商鞅在与秦孝公进行对话的时候，采取了以退为进、不断试探、步步为营的策略。也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形下，士在面对君主的时候并无太多选择余地，而是要根据君主的喜好来看碟下菜。只有当孝公明确对王道和儒家礼治思想没有兴趣之后，商鞅才好抛出自己最擅长的法家治国思想。

其次是说服贵族同意。商鞅的变法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就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鞅的意思是治国的方略不能一概而论，国家的治理要根据当时的情形来制定。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商鞅提出改革必须要立法，而不是无法而行。

再次是取信于民，具体说来采取了立木为信的做法。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结果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

立木为信的故事，用现代的观念来看，其实就是法律的实施效力问题。如果国家颁布的法律没有发生实际效果，那么意味着国家的信用度下降，法律本身缺乏权威，立法也是徒然。所以这里涉及改革与立法之间关系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如果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制定再多的法律规则也没有意义。

法律富于操作性

商鞅在第三次会面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思想和具体法律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法律规则比较切合人的实际，对于老百姓建功立业产生了最大的激励，相当于最大程度地鼓励全民创业，为出身下层的老百姓打开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从经济学的视野来看，商鞅是制度经济学的运用大家。通过制度的改变来最大程度地激励老百姓去建功立业。另外，商鞅的九论的规定特别富于操作性。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其实质就是国家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

中华“和”文化
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作者：李铁



既和且平

作者：阿朗一笔